

5月26日至28日,由复旦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捐赠资助的“上海论坛2012”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未来十年的战略”,探讨亚洲的应对之策和发展道路。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吴心伯,韩国延世大学社会科学大学政治外交学科教授Chung-in Moon,和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学教授Terada Takashi,参加了主题为“塑造新的东亚地区秩序”的分论坛。

本报记者就以下五个问题采访了这三位学者并整理成文:(1)尽管东亚地区成员国之间的

编者按

地区合作和经济联系在加强,但外有美国的牵制,内有各种政治与安全分歧,未来十年,能否建立新的地区秩序?(2)要建立东亚地区的良好秩序,应当从哪个领域开始?你将如何设计其内涵?(3)最近东亚地区发展有两大事件值得关注,一是中日韩宣布开始谈判建立自贸区,二是中菲南海争端,你如何解读这两起事件?(4)要建立东亚地区的良好秩序,主要的障碍或者说危险是什么?(5)要建立东亚地区的良好秩序,你会建议你的国家或者中国怎么做?学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特此声明。

中国应考虑建立“南海问题五方机制”

建立新的地区秩序取决于东亚各国的努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亚近期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好事情。因为这迫使东亚各国去处理、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地区秩序将应运而生。

挑战意味着机会,关键是看东亚各国如何应对。总体来说,我对东亚建立新的地区秩序有信心。东亚各国不仅要抱着积极应对问题的态度,而且要以正确的方式去应对;不仅要解决单个问题,而且要从未来的大格局的角度考虑问题。

建立东亚地区的良好秩序主要可以从两个领域入手。首先是经济领域,加强东北亚三国之间的合作。中日韩三国为东北亚经济贡献了85%的份额。因此,只有中日韩三国联手,谈东亚经济合作才有意义。现在在中日韩三国已经开始建立自贸区。未来可以从三边FTA进一步拓展到东亚FTA。

其次是安全领域。这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领土领海争端、朝鲜核问题、非传统安全领域。针对不同的问题应当建立不同的安全机制。应当“两条腿走路”——多边机制和双边机制并行。具体来说,南海问题主要涉及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这五个国家。那么,这五方之间能不能搞一个机制,即“南海问题五方机制”?在朝鲜核问题上,应当继续六方机制。

在中日韩自贸区问题上,中国和韩国的动作比较快,因为双方都有达成协议愿望。在中日韩三国之间达成协议,相对来说会比较慢。

但我对未来十年中日韩三国之间达成协议有信心。因为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外,日本和韩国在进入中国市场上有竞争,韩国又将与中国先达成自贸区协定,所以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压力。既然中韩已经达成了自贸区协定,那么十年内中日韩之间也能达成自贸区协定。

在黄岩岛问题上,有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菲律宾国内因素的影响。阿基诺三世希望借机使民众的注意力向外转移。其次是国际因素的影响。美国加强了亚太战略,菲律宾想乘机把美国拉进来。

因此,中国应该分两个层次处理



这个问题。首先是黄岩岛本身如何处理。中国在黄岩岛的主权诉求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应趁机加强对黄岩岛的实际控制。中国应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代之以执法船、捕鱼船等显示存在和管控。

其次是南海问题如何处理。中国应考虑建立“南海问题五方机制”,但同时不排除双边机制。“南海问题五方机制”表明中国愿意同相关国家一起解决南海争端,同时也拒绝无关国家如美国、日本介入南海问题。

挑战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内部的包括一些传统挑战,如历史遗留问题、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抬头、领土争端。东亚国家内部治理不良会影响地区的治理。内部问题会外溢,向外转移。外部的涉及美国因素。因为美国从骨子里还是担心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还是想要牵制。所以它会打一些牌,企图离间、分化东亚国家。

中国要做的事很多。首先要积极

推动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推动地区的良好治理。在这方面,我们正着手与日韩达成自贸区协定。

更重要的是地区安全问题。这是我们的短板。中国比较擅长经济合作。但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安全方面的短板,那么我们很难在安全问题上提高发言权。目前,一些国家对日本比较防范,再加上美国主导了东亚的安全议题。因此,中国需要设立制度、创建相关机制,处理纷争、解决问题。

第三,中国应加强地区认同。中日韩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譬如复旦大学就在和日本韩国的大学合作开展“亚洲校园计划”,促进东亚三国学生之间的交流,加强他们的区域认同。我们不希望中国的邻居把中国看作是“陌生的邻居”。在教育和社会互动方面,中国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本报记者 马凌 采访整理)

东盟模式：“谈话铺子”的价值

我认为东亚将建立新的地区秩序,但这必须建立在美国的帮助之下。之前,关于地区安全问题的讨论通过强调共识的对话和主权互不干涉原则,集中在软性议题,或者说非传统安全议题上。

但自从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执政后,美国和东亚地区内的民主国家着手建立基于规则组成的种种机制,并使用这些机制来处理硬性议题,譬如领土争端。这个转向的标志是美国将重心从东盟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移到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上来。前者更多地被认为缺乏清晰的政治目标,而后者则意味着美国现在是个充分参与者。

东盟论坛和东亚峰会的指导原则都是所谓的“东盟模式”(ASEAN way),即非正式地规定以互不干涉,和不具有约束力的基于共识的决策方式开展地区合作。“东盟模式”的作用常常被形容为一个“谈话铺子”(talk shop)。它只是为大国的领导人和部长提供了一个聚首并交换对地区安全和经济议题的意见的途径。

如果与会代表们能讨论硬性议题,那么不管最终是否能达成具有约束力的义务,“谈话铺子”的价值可以得到加强。美国通过在2011年的东盟论坛上提出南海领土争端议题,已经在加强版的“谈话铺子”里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当然这被中国视为“对抗”,因为中国在南海宣称主权,并一贯坚持和争议国家进行双边谈判而不是通过多边会谈的方式解决争端。

南海海域不仅是一片重要的捕鱼地,而且其海底蕴藏着预计23亿至30亿桶石油。因此,毫不奇怪,对燃料饥渴的北京把这块地方视为战略利益。

重要的是,美国坚持所有涉及南海争端的国家必须提供法律证据来支持它们的领土要求。白宫坚持使用东盟峰会这一平台来处理战略和安全挑战。它重申了在南海领域必须遵守国际条约和准则。这就为北京解决南海争端制造了问题。

因此,中国的处境非常微妙。它得抵御美国在这个地区越来越大的介入。它一开始是由菲律宾促成的,当时中国没有认真对待这样的后果。

在2011年11月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东盟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重申了领土要求需要法律证据的主张。这被认为是加速了东盟峰会作为一个在处理硬性议题上以结果为导向的机构。

因此,当时所有与会的领导人,除了柬埔寨和缅甸的领导人,都谈及了和平解决南海领土争端的需要。而在美国实施它的亚洲枢纽战略(Asia pivot strategy)之前,东盟在保护它的成员国的南海领土诉求上没有起到一个有效的保护盾。

我认为,美国在东南亚和东盟峰会的介入有助于解决关于亚洲区域主义(Asian regionalism)的争端,即何为达成区域合作的最有效的机制。

有效的选择项包括东盟10+3,东盟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要找到答案必须清晰地界定何为“合作”。但美国对东盟的介入有助于减少竞争。并澄清不同的分工。

美国一直在推动建立亚太自贸区。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达成亚太自贸区的第二步。这一诉求赋予亚太经合组织在市场整合中最重要机构的地位。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东盟国家要求建立地区金融合作的呼声越来越多。在这之前,自2000年清迈协议签订后开始发展的东盟10+3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多边地区金融合作机构。该机构于2011年5月在新加坡建立的东盟10+3宏观经济研究处(ASEAN+3 Macroeconomic Research Office)提供了东亚地区目前欠缺的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机制。

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合作机制将会长时间存在。因为经济和政治实力更强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对采取主动行为并不感兴趣。但中日韩的三边合作正随着跨政府和政府之间的网络如火如荼地展开,譬如东盟峰会,以及部长级官员和高级官员在金融、外交、经济、贸易、环保、健康、文化及旅游方面的会议。

东北亚的这些政策网络代表了快速扩张的中日韩三国合作。它们在中日韩三国官员之间培养了合作的精神。此外,中日韩已经宣布了建立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协议。鉴于这三个国家贡献了清迈多边协议80%的总量(120亿美元),且它们三者的GDP总量占东亚地区的近90%,中日韩之间日益加快的合作将挑战东盟在东亚地区的角色。

最后,在南海争端问题上,我建议中国采取“定向领导”(directional leadership)的策略。它应当将其他声称在南海享有主权的国家的利益纳入考虑之中。所谓“定向领导”正是将不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努力汇聚到一起,共同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

中国应该对激进行为如在越南水域割断越南调查船的缆绳保持克制。中国应当组织一个会议,和其他声称在南海享有主权的国家加强交流。美国应签署《联合国海洋公约》,以使得它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条约的诉求合法化。

(本报记者 马凌 采访整理)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中国应考虑建立“南海问题五方机制”,但同时不排除双边机制。“南海问题五方机制”表明中国愿意同相关国家一起解决南海争端,同时也拒绝无关国家如美国、日本介入南海问题。



Chung-in Moon
韩国延世大学社会科学大学政治外交学教授

建立东亚地区良好秩序的最大障碍是失真,或者说是对现实的扭曲。其次是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再次,是共同命运体意识不强。事实上,东亚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我认为,所谓秩序(order)分为五个方面:指导原则(governing principle), 准则(norms), 原则(principles), 条例(rules), 程序(procedures)。

建立东亚秩序的指导原则是合作,譬如在经济方面,东亚国家应该共同在WTO和IMF的框架内合作。准则和原则则包括很多方面:合作、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和平解决冲突、不使

用武力、拒绝民族主义。总的来说,就像中国提出的“和平五项共处原则”。在区域合作方面,欧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欧盟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牢牢地捏在了一起。

建立东亚地区良好秩序的最大障碍是失真,或者是对现实的扭曲(distortion of reality)。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存在对美国和日本的妖魔化报道。其次是民族主义情绪抬头。东亚国家目前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利益至上,大于地区利益。再次,是共同命运体(co-variance)意识不强。事实上,东亚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要建立东亚地区的良好秩序,东亚国家首先要清楚地设立目标——自由的地区秩序。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第一,要创建并促进共同繁荣。譬如,中日韩宣布要开始谈判建立自贸区。第二,打造“多方安保协力体”,确保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第三,去政治化,加强区域合作。让民众控制政治家,而不是反过来。第四,超越同盟关系。韩国和日本不应当因为自身是美国的盟国,而把中国和朝鲜视为威胁。第五,更多的合作,特别是年轻一代。要培养年轻人“东亚共同身份”的理念。

中国在建立东亚地区的良好秩序上应该发挥两个作用。首

先,展示自身的领导力。其次,容忍小纠纷。譬如说南海问题。中国应该和日本合作解决。因为如果中日两国能保证南海和平,那么美国就没有了借口,它就不能操纵这个议题,它的介入就不具有合法性。

在南海问题上,我还建议中国注意倾听第三方的建议。中国需要的是说服菲律宾。因为领导力指的是被别的国家尊重。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它就应该意识到整个世界都在关注它在南海问题上的一举一动。中国应该奉行仁义礼智信的原则,在南海问题上采取聪明的、容忍的态度。

(本报记者 马凌 采访整理)

